

第一章

-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 爸爸送我去找妈妈
- 在苏联，我与妈妈相会
- 二哥岸青指着毛泽东像说：他是我们的爸爸
- 我给毛主席写信问：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这个名字是后起的，我的小名叫娇娇，大名曾叫毛娇娇、贺娇娇。

在说我父亲之前，我想先说说我自己。

我是 1937 年，在陕北保安县出生的。关于我

的生日，又有许多种说法。有人说，我是 1936 年 8 月（农历）出生的；有人说，我是 1936 年的冬季出生的；我爸爸说我是 1937 年初出生的。妈妈也这样说。

其实，生日对我这个普通百姓来讲，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日子。清楚与不清楚，也无关大局。反正我该来的那天，也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就行了。虽然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少有不知道自己生日的，但是，在我出生的年代里，爸爸、妈妈正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斗，孩子带来的欢乐他们不可能充分地享受，更何况，我和黄土高原上所有的孩子一样，出生了，不过是一个小生命，生日，并不重要，对于毛泽东的女儿来说，更不重要。因为，对于爸爸来说，他期待的是一个民族新生的日子。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跋山涉水，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1936 年秋，毛泽东——我的爸爸，率红军东征后，来到妈妈已先到达的保安县。

保安县，是个小县城，全城人口还不足四百。这儿人口不多，房屋也就不多，再加上黄土地的贫瘠，想找一孔好的窑洞住，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的父亲毛泽东和母亲贺子珍就住在保安县小

石山的一孔破烂不堪的窑洞里。窑洞光破还不说，里边黑洞洞的，洞顶上还时不时地往下滴水，里面格外潮湿。

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很幸运，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接生了我。我该称她为同妈妈或刘妈妈。

当年，她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妈妈的身边，精心地照料、护理着妈妈，用她那细致、娴熟的动作，以一颗慈母般的爱心，将我这瘦小的身躯接到这个世界上。

我的第一声啼哭，是从她的双手上托着的小身躯里发出来的。她为我洗干净身子，包裹好，又重新双手托着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我的长相。大概她是想判定一下，我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吧！看了一会儿，她笑吟吟地把我放在了妈妈的身边。

后来，刘妈妈谈起当年时，她这样说：

1936年5月5日，东征胜利回师后，中央和毛主席由瓦窑堡来到保安县。毛主席住在城内炮楼山下的窑洞里。我们住在离他不远的北山坡上。

那年，冬季的一天早上，毛主席的警

卫员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我说：“快！快！贺子珍要生孩子啦，毛主席叫你快去。”我赶紧拿上前些日子就准备好的小被子、小衣服跑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老远，我就听见贺子珍在院外的岗楼里喊叫。毛主席见我来了，说：“刘嫂子，快来呀！”

我走进岗楼，见贺子珍面色蜡黄。消瘦的身子躺在地铺上，冷得直打哆嗦。

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高粱秆子抹着泥巴搭起来的。岗楼里四面透风。我很生气地埋怨他们：怎么能挑选这地方生娃呀！毛主席说：“石窑里太潮了，是子珍跑到这里来的。”

毛主席焦虑地问我怎么办？我先让子珍喝了半碗开水，让她的身子暖和些，然后，扶住她，替她按摩腹部，使她减少些痛苦。不一会儿，娃娃生下来了。这时，医生赶来为娃娃扎了脐带，将子珍抬回窑洞。我用半盆热水洗了娃娃的身子，裹起来抱进石窑洞安顿好，就跑向北山坡家里，去取前几天就准备好的鸡蛋。

刘志丹的牺牲，使我的脑子受到很大刺激，影响了我的记忆。我一时怎么也想

不起把鸡蛋放在哪里了，一直翻到中午才找到。当我推开毛主席的房门时，见子珍正在吃鸡蛋，不知道是谁送来的。我端着刚找到的那碗鸡蛋木呆呆地站在她身旁，一个劲儿地落泪。

娇娇生在苦难的岁月，生下来时又瘦又小，一对小眼睛睁开看人，真叫人心痛。

后来，她到了保育院。再后来听说她到苏联找妈妈去了。解放初，她回国以后，有一年在上海我见到了她。一见面她就叫我“刘妈妈”。后来还托人给我捎来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敬赠刘妈妈留念，毛娇娇。”再后来，她改名叫李敏了。

这就是我的出生经历。

再大些时，我知道了，同桂荣妈妈为我接生时，刘志丹刚刚牺牲半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积极组织民族统一战线，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年中，中央派刘志丹带领红军打过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刘志丹作战英勇，不幸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回到保安不久牺牲了。我出生的保安也是他的家乡，为纪念他，改成现在的志丹县。

听大人们讲：我出生时，爸爸和妈妈的老战友，红军女战士康克清妈妈、邓颖超妈妈都闻讯来庆贺。

爸爸笑咪咪地招呼她们进窑里坐坐。她们问：“子珍生了没有 顺利不顺利？”

“生了，生了，像母鸡下蛋一样，生了个大鸡蛋。”爸爸风趣地说。

后来，听人们讲起来，我觉得爸爸挺有意思。我也想不出为什么爸爸说：“生了个大鸡蛋。”他是指我身子瘦小而言呢？还是指我是个女孩呢？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我就无从得知了。

据说，当时邓颖超妈妈抱起我来，看看我那瘦小的身子，产生了爱怜之心，连声说：“真是个小娇娃，一个小娇娇。”

爸爸听了这句话，便说：“对，就叫娇娇！”

后来，有人叫我毛娇娇，有人叫我贺娇娇。其实不管叫什么，我都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我的到来，为爸爸妈妈的生活增添了喜悦与欢乐。这一年，我爸爸 43 岁。尽管他早已是四个儿子三个女儿的爸爸了，但在那动荡的岁月里，孩子们的下落都不清楚。杨开慧妈妈生的岸英、岸青、岸龙，自从杨妈妈牺牲后，一直没有确实的消息。

爸爸和妈妈在苏区生了哥哥小毛，一直托给叔叔、婶婶——毛泽覃、贺怡寄养，现在也不知道情况。后来妈妈又生了两个女儿，都送人了。这些孩子的下落都不清楚。所以 43 岁的爸爸身边，倒是只有我一个孩子。爸爸亲眼目睹了我的诞生，亲耳听到了我的第一声哭啼。

婴儿的第一声哭是宣言书，她向世界宣告：我来了！婴儿的第一声哭，又是进军号，她向人们宣告：我加入到你们这个行列里来了；婴儿的第一声哭，就像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像是唱出的最悦耳、最动听的乐曲，叫人们百听不厌，百听不厌。这乐曲在父母的耳边萦绕，是使父母终生难忘的欢乐乐章。

爸爸双手抱起我，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小脸蛋、小嘴巴、小鼻子、小额头，像谁呢？他看看疲惫的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像，像！像子珍的清秀、文静，是个好娇娃。”

爸爸抱着我。我贴在他那博大的胸怀里。他的博爱像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离开母体的孤独感没有了，我吮动着小嘴巴，眼睛连睁都不睁地熟睡在他的怀抱里。

此时的爸爸在想什么？我当然不知道。妈妈的心里明白。就在长征大军翻越六盘山，到达甘肃南

部地段的时候，我开始在妈妈身体里孕育、生长。冰凉的山水，口口的雪花，变成了哺育我的乳汁；野果、草根，经过母亲的咀嚼，变成了我的营养主食。我这小小的生命，从孕育的那天起，就跟着妈妈同患难，共甘苦，就跟着妈妈一路风尘，来到陕北。我能平平安安地来到世上，见到父母，享受到父母的亲情之爱，已实属不易。比起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可真算得上是一个幸运而又幸福的人了。更何况我是生在陕北这块热土上呢！

可是，我没有能像其他的同龄孩子那样，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因为我的父母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或学习。

听说，我刚刚满月，父母就把我托给奶妈喂养，妈妈到抗大学习去了。只有星期六放假才能回家。一周也只能见我一面。到我哑哑学语的时候，妈妈又到苏联治病去了。细算算，我在妈妈身边也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妈妈是个什么样子？我没有一点印象。

爸爸忙于党和国家的大事，哪能担当起当妈妈的责任呢？他照顾不了我，就又把把我寄养在当地一户农民家里。虽然享受到陕北农家孩子同样的生活，但我却失去了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到的亲生父母的关怀和爱护。在这家呆了多久，我记不清。别的

人也说不准确又是什么时候把我送到在当地合作社工作的一对长征夫妻家里抚养，在那里又是呆了多长时间，我更搞不清。但是，有些老人又叫我是合作社的娃娃。再后来，我就被送进延安的洛杉矶保育院去了。

我好像听人说，在延安时，妈妈的战友、长征过来的四川人张秀英是我的阿姨。把我托给她时，我已经是一岁多了。等我到保育院时，张秀英阿姨也在保育院当保育员。我俩算是“老熟人”了。一直到 1941 年，我都生活在这里。

爸爸住在杨家岭、枣园多久，我都记不得。他到保育院来过没有？我也记不得。我是否回过家？当然，我还是记不得。

爸爸送我去找妈妈

我对爸爸的记忆，实在淡极了，能记得的是 1940 年，爸爸送我去苏联，可这个印象仍然是极模糊的。1940 年，在爸爸的亲自安排下，我和朱德爹爹的女儿朱敏，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和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四个孩子一起，搭乘一架苏联的轰炸机，转道甘肃、新疆到苏联，他们是去学习，我是去找妈妈。

黄土高原的气候是：“夏日热得慌，下雨泥汪

汪；冬天透心凉，刮风满天黄。”那时，正是冬季，那狂风，那寒冷，那细沙碎石被风卷起来，再甩到人们的脸上、额上、鼻尖子上，甭说小孩会觉得如刀割一般痛，就连大人也常皱眉头，无法忍受。这狂虐的西北风，吹得人浑身都泛起鸡皮疙瘩，那真让人难受。

那天早上，朱德爹爹同康克清妈妈带着朱敏，我则坐在爸爸的怀里。我们和另外两个孩子同乘一辆轿车向飞机场驶去。

一路上，我看到的除了山就是道路两旁枯黄的野草在风中摇动，风吹着黄土，细沙满天跑，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路上连个来往的行人都没有。当车子过了桥儿沟再往东驶，老远老远看见了机场里升起的一股股的浓烟。走近时才看清楚，原来机场里支了个老大老大的锅，在为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烧水，上水。我们都看见了几个人，正忙乎着，做着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机场里满地都是枯黄的杂草，风在呼呼地叫，飞机在轰隆隆地响。那西北风呼地一阵，一股寒冷袭来。我望望四周，拉紧爸爸的手，紧紧地紧紧地贴在他的身旁。

尽管天地如此寒冷，但当我们看见这个庞然大物时，竟忘记了寒冷，也顾不得将要与爸爸离别的

悲伤。我松开爸爸那温厚的大手，跟着他们高兴地往飞机上爬。

我不懂得离别的悲伤，也不知道离开爸爸后会孤独，会恐慌。我也一味地跟着大哥大姐的后面，像模像样地学着他们东摸摸西瞧瞧，感到好玩极了。我们都开心地笑着。

大人们帮我们把行李放好后，我们光顾高兴，好玩，还没有发现，他们已悄悄离去，飞机舱门也不知什么时候关上了。只觉得飞机一阵颠簸，等我们明白过来，飞机已腾空而起……

这才发现，朱德爹爹、康妈妈、我的爸爸……都没有在我们身边。

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爸爸呢？他坐在哪儿呢？我左看右瞧，都没有找见爸爸。这时候，我仿佛突然长大了，明白了。爸爸是怕我伤心，才悄悄地走了。我伤心地低下头，一声不响地坐在朱敏大姐姐的身旁。

这些天来，我患感冒，又拉肚子。这时候，我的肚子又痛了起来；又要拉肚子。朱敏真不愧是大姐姐，看到我肚子痛得直哭，就赶紧帮助我，找到破纸铺在地上，然后她安慰我。其他两个男孩子也一起过来帮忙。大家手忙脚乱了一阵子，总算帮我收拾干净了。我的肚子不痛了，就又静静地坐着，

一句话也不说。

我坐在这颠颠簸簸的飞机上，两只手不时捂着肚子。我感到头痛，便蜷曲在飞机舱的角落躺下，眼泪汪汪的一声不吭。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是想远在苏联的妈妈吗？我记不起妈妈的样子，当然也就想不出来；是因为，远离我的爸爸吗？爸爸留给我的的是高大的身影，温暖的胸怀，笑眯眯的脸庞，是我的小手在爸爸那温厚的大手里转来翻去的印象。

这就是我的爸爸毛泽东留给我 3 岁时的记忆。而就是这点记忆，又随着日后的漫长岁月而渐渐淡了，浅了，消失了，忘却了。

飞机把我带走了。它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离我的爸爸。我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有黄土吗？有窑洞吗？有我熟悉的阿姨和小朋友吗？我还能再坐到爸爸的怀抱里吗？他那温厚的大手还会再牵着我的手吗？我能再见到那么高那么高的爸爸吗？爸爸说是让我找妈妈去，妈妈又是个什么样子？我的小脑袋里就这样忽而东忽而西地胡乱想着 胡乱猜着……

在苏联，我与妈妈相会

经过一番折腾，我们终于到了苏联。

当我在苏联莫斯科见到妈妈时，说不上激动，

也谈不上兴奋。我毕竟还只是个 3 岁的孩子，可对妈妈说来，可就全然不同了。当有人把这消息告诉她说：“你的女儿娇娇要来莫斯科找你来啦！”妈妈听了摇摇头，不信。认为是同志们和她开玩笑，逗着玩。

“莫逗嘛，她怎么会来？”妈妈虽然嘴里这么说，可心里却想：这事也许是真的。

她是怎么知道我真的要来了，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反正那天妈妈是到机场接我的。一见到我，妈妈便一把将我揽在怀里，问着，亲着；亲着，问着，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妈妈高兴地一遍又一遍地问我：

“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

“我是娇娇，来找妈妈呀。”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啦？”

“我给妈妈带来娇娇。”

离别 3 年，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与妈妈相会了。

我来到妈妈的身边，妈妈可高兴啦！我俩在一起，妈妈唤我的亲切柔声，我叫妈妈的甜甜细音，在房间里久久回响着。

可妈妈还要学习、工作，不能天天陪着我玩，就只好把我送到国际儿童院的幼儿班。我又开始过上了像在延安时的集体生活。

在这里，除了有妈妈的爱之外，还有亲我爱我的两个哥哥——岸英、岸青。

虽然生活在异国的土地上，但四个人，节假日团聚在一起，围在妈妈的身边。这也是一个温馨的欢乐的家呀！岸英、岸青是在上海地下党和张学良将军的帮助下来到苏联的，他们比妈妈来得早。

妈妈是 1937 年底，为了治伤离开延安到西安，经兰州、迪化再到苏联的。

妈妈是在这里与我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杨永福（岸英）、杨永寿（岸青）相识的。

后来听两个哥哥讲，他们的相识，还真有点戏剧性：

1938 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位叫阿烈耶夫的老师领着一个高高的身材，30 岁上下的女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我们跟前。老师向我们介绍说：“谢廖沙（岸英哥哥俄语名字的爱称）、戈勒（岸青哥哥俄语名字的爱称）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我俩一愣！到苏联一年多了，我们没有亲人在这里，怎么会有人专门看望我们呢？

面对这位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女人，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从她的举止、神态上看，她不像那些平时来看望我们的阿姨；从她的言谈中好像她和我们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殊关系。我们一时也搞不清楚。该怎么称呼她好！叫同志，还是叫阿姨？干脆，什么也别叫。我俩一声不响地同时又用审视的目光，偷偷地打量着她。

她，浓眉毛，大眼睛，瘦长的个子，温和的脸庞上带着点挺不自然的微笑。她好像也是有话不好直说一样。看样子，她很疲惫，也有几分忧郁。看她的表情，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怎样才能打破这片刻的沉静呢。她只好回过头来问阿烈耶夫老师：“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站在一旁的阿烈耶夫看到三个人不自在的样子，忙来解围说：“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谢廖沙；他是弟弟岸青，又叫戈勒。”说着又转过身来，对我们两个说：“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刚从中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

“是的！我就是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文英。”她脸上漾着笑意，亲昵地说：“你们的爸爸可想你们哪！”

自从妈妈杨开慧牺牲后，我们便失去了母爱，“妈妈”这两个字，对我们来讲真是太生疏了。我

们既不喊她妈妈，也不向她打听爸爸毛泽东的情况，我们不大习惯这个事实。

“你们父亲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她为打破僵局这样说。

阿烈耶夫老师看到我们开始交谈起来，便招呼她坐下来，自己悄悄地走开了。

她见我们的床铺又脏又乱。便三下五除二地为我们收拾起来。

她把拎来的水果放在桌上，把我们又脏又乱的床铺收拾干净。整好后，又弯腰把床下的“杂货摊”清理好，又把我们的脏衣服卷起来，拿到河边去洗干净，晾好……看到她屋里屋外地忙活着，我们怪不好意思，也觉得过意不去。就跟着她也干起来，但却没有说一句话。

屋里整理得干净、漂亮，像样了。看样子她也累得够呛。

我们坐下来。她把苹果削好送到我们手里，我们真不好意思接受这种爱。可当我们看到她的一片真诚和充满母爱的眼神时，也忙泡了一杯热茶送到她面前。可谁也没有喊她一声贺妈妈。

她所在的东方大学离我们的儿童院不远，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她总要带些物品来看我们，像慈母一样关怀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她把每月发给

她的红军干部 70 个卢布的待遇费，除了自己的必需开支以外，把剩余的钱都花在了我们两个身上。她给了我们温暖和母爱。渐渐地，她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员，有时她不来，我们还怪想她的，一有空儿，我们就到她住的共产国际办公楼的一间小屋去玩。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见到她。她是生病了还是回国了？我们决定去看看她。

刚一进她的房间，看到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男孩。我们相视笑笑，我们明白了，这是父亲毛泽东的又一个儿子，是我们的小弟弟。

“唉唷，这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大哥盯着那小脸上打着褶的小男孩，左端详右端详，越看越高兴，越看越喜欢。瞧他高高大大的额头，多像爸爸，就连鼻子、眼睛也都像爸爸。

“对！这个小男孩还真像爸爸。”二哥说着就去轻轻摸他的小手腕，逗着他玩。

“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她说望着望我们。

看到我们高兴，她也会心地笑了。她笑得那么甜，那么真。这样的笑容是过去很少见到的。

她的小房间里，成了我们团聚的地方，也成了我们的家。